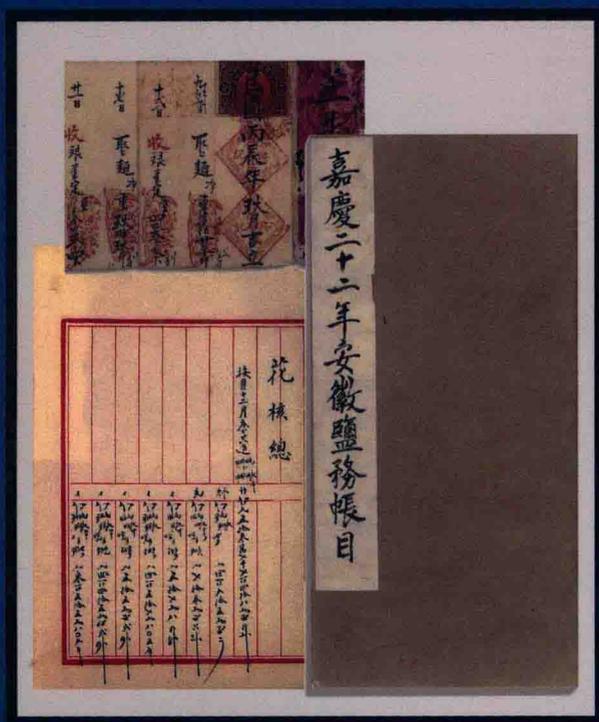


會計文博學刊

Journal of Accounting Museum



- ◎ 中国会计技术史简论
- ◎ 自贡地区盐业井灶会计组织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 ◎ 中国古代账簿的演进与流变
- ◎ 明代吏治中的信息选择性奏报策略及其再现
- ◎ 意大利复式簿记思想发展的逻辑
- ◎ 试论先秦两汉遗策中的财产清查与对账方法
- ◎ 论中国特色会计文化的基本精神
- ◎ 会计制度在近代企业中变迁研究
- ◎ 中国会计博物馆馆藏账簿专题——中国账簿

1 / 2016
(第1卷,总第1期)



立信會計出版社
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

會計文博學刊

Journal of Accounting Museum

2016 / 1

(第 1 卷, 总第 1 期)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田志心	中国会计学会
付 磊	首都经贸大学
朱建弟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曲晓辉	厦门大学
孙 铮	上海财经大学
陈冬华	南京大学
宋小明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邵瑞庆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李颖琦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周守华	中国会计学会
张敦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周勤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
姜国华	北京大学
韩传模	天津财经大学
谢 荣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窦瀚修	立信会计出版社

主 编	邵瑞庆
执行主编	宋小明
编 辑 部	陈春华 黄成良
主 办	中国会计博物馆
学术支持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
投稿邮箱	kjwbxk@163.com



立信会计出版社

LIXIN ACCOUNT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计文博学刊. 第1期/ 邵瑞庆主编. —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429-4845-8

I. ①会… II. ①邵… III. ①会计学—文集 IV. ①F23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2705 号

策划编辑 黄成良
责任编辑 黄成良
封面设计 周崇文

会计文博学刊(第1期)

出版发行	立信会计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电 话	(021)64411389	传 真	(021)64411325
网 址	www.lixinaph.com	电子邮箱	lxaph@sh163.net
网上书店	www.shlx.net	电 话	(021)6441107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7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29-4845-8/F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订差错,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发 刊 词

古今中外,会计一直是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中华会计文明亘古绵长,并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展示着独特魅力。2008年,由“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博士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出版社联合倡议筹建“中国会计博物馆”,学界、业界等纷纷响应,积极支持,群策群力,中国会计博物馆经过5年多时间的筹建,于2013年秋落成开馆。

中国会计博物馆坐落于上海松江大学城,展陈面积2500平方米,由中国馆、国际馆和名人堂三大展厅构成,是一座集收藏、展示、交流、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博物馆。会计博物馆以保护、收藏、研究中国会计历史文物为要务,以挖掘和传承中国优秀会计文化、树立和传播中国会计精神为己任,努力成为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会计内涵和精神的窗口。

自开馆以来,中国会计博物馆以专业、特色、严谨赢得赞誉,在促进会计史学研究、会计文化交流与会计教育方面做出了贡献。史海钩沉,脉络爬梳,需要有个学术平台来展示会计史学研究、交流会计文化思想,创办一本会计史学期刊也就成为了中国会计学人的一种夙愿。依托中国会计博物馆的丰硕馆藏资源,受益于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的学术支持,中国第一本会计文史期刊《会计文博》应运而生。

《会计文博》旨在围绕会计人物、文物、文化与思想,聚会计馆藏精华,研会计古今学术,构建会计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平台,促进中国会计学术思想的传承,助力中国会计文化事业的发展,推进中国会计文化走向世界,复兴中华会计文明。



目 录

中国会计技术史简论.....	1
/Nanny Kim	
自贡地区盐业井灶会计组织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17
/付 磊	
中国古代账簿的演进与流变	21
/张 涛 韩传模	
明代吏治中的信息选择性奏报策略及其再现	29
/赵子夜	
意大利复式簿记思想发展的逻辑	33
/刘常青	
试论先秦两汉遗策中的财产清查与对账方法	38
/陈 敏 陈菁菁	
论中国特色会计文化的基本精神	43
/杨兴龙 夏 青	
会计制度在近代企业中的变迁研究	51
/柯 华 钱顺吉	
中国会计博物馆馆藏账簿专题——中国账簿	61

Contents

Accounting Techniques in China: A Brief Discussion of a Long History 1
/Nanny Kim

Zigong Salt Industry 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Its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17
/Fu Lei

The Evolution and Changing of Chinese Accounts-book in Ancient Times 21
/Zhang Tao, Han Chuanmo

Selective Reporting Strateg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Officials in Ming Dynasty
and its Representation 29
/Zhao Ziyue

The Logic in Italian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Thoughts Development 33
/Liu Changqing

A Study on Property Verification Method in Qiance in Pre-Qing and Han Dynasty 38
/Chen Min, Chen Jingjing

The Basic Spirit of Accounting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43
/Yang Xinglong, Xia Qing

The Change of the Function of Accounting Systems in Modern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the Rong's Enterprises 51
/Ke Hua, Qian Shunji

Chinese Account-Books Collected at China Accounting Museum 61

中国会计技术史简论

Nanny Kim*

(德国海德堡大学)

摘要 从早期国家的历史传统来看,因为受到编写历史的传统性选择和文字材料耐久性等因素限制,直到很久以后,才有资料流传下来。本文探讨会计技术发展的历史,但并不着眼于不同会计技术的优缺点,而是着重探讨其会计意义。文章先用一种长期性观点确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某些动态变化的瞬间,以便能概括介绍其悠久历史。第一部分介绍会计技术从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时代基本模式的形成到晚唐至宋代的快速发展,以及在明朝和清朝鼎盛时期再次发生的长足进步。这三个基本的或动态的主题将分为三方面随后依次展开。第二部分讨论其起源、术语及会计制度,为研究特定时刻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探讨唐宋时期的会计和典当行的出现。第四部分对明清时期账簿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反映了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文化处于低谷时的会计体系。

关键词 会计技术 起源与变革 典当行 四柱结算 四脚账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会计也是始于书写。从早期国家的历史传统来看,因为受到编写历史的传统性选择和文字材料耐久性等因素限制,直到很久以后,才有资料流传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借、贷记录的复杂计算形式的可靠文献,在18世纪之前是没有的。中国会计在技术方面似乎晚于西方且受到西方影响,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会计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领域,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本文并未着眼于讨论不同会计技术的优缺点,而是着重探讨会计技术的重要性。我先用一种长期性观点确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某些动态变化的瞬间,以便能在这篇不长的论文里概述其悠久历史。第一部分介绍会计技术从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时代基本模式的形成到晚唐至宋代(约公元900—1200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在明朝和清朝鼎盛时期(约公元1500—1850年)再次发生的长足进展。这三个基本的或动态的主题将分为三方面

随后依次展开。第二部分讨论其起源、术语及会计制度,为研究特定时刻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探讨唐宋时期的会计和典当行的出现。第四部分则对明清时期账簿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反映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文化处于低谷时的会计体系。

一、起源与变革

会计是一项将经济业务转换成永久性记录的管理方法。这种监督管理的过程和控制的程度千差万别,在将会计史再现为积累的进程中可以看出其线性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文字系统和书面材料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从古至今一直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局面。然而,历史往往在技术传统和文化背景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下表现为非线性性的发展。人们开发新技术以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在会计方面,根据经营方式、机构和企业的规模、经济繁荣程度和复杂性的

* 作者简介: Nanny Kim, 博士, 德国海德堡大学高级研究员。作者感谢立信会计研究院宋小明博士对文章的校译。

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因此,技术可能经历高度发展以及(由于经济萧条或由于文化偏好的改变被抛弃和遗忘而导致的)严重衰退时期。历史的重构必须关注传统的线性重建和材料背景,尤其应注意出乎意料的迂回曲折现象。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其起源和发展轨迹。不过,对于具体环境中的技术及其目的,也有充分的文献支持。在了解有关欧洲和东亚会计史比较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中国会计史上有三个方面显得尤为耐人寻味:人口和粮食库存会计、账簿记录扩展的过程中货币化和货币单位问题、与复杂的会计形式相伴而兴起的担保与典当行交易。本节将简要探讨这三个问题。

(一) 人口和粮食库存会计

在欧洲,我们倾向于将会计视为一种商业活动。在古代中国,“會計”一词(字面意思为“记账”和/或“加总”)出现在国家的核心职能部门中,即人口和耕地的登记。其目的是管理和征税以及对军事后勤和人口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粮仓的维护。

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定期监测流入和流出,出生和死亡人数以及有劳动能力的人数与耕地面积的比例或储存与发放的粮食的比例。在东亚地区,粮仓系统不论其规模还是功能都具有其特定性,中国政府一直将其维持到现代。其对国家运转和政府合法性的核心作用说明了簿记技术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根本性意义。

管理粮仓涉及监控粮食的流入和流出以及库存的定期更换,还需要结合进行业务的监管及运行成本控制。其账务记录必须保持足够的动态性,能够反映价值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因为粮食霉变所造成的损失率的变化。在早期,国家粮仓是反周期性运作的,在收获季节后粮食丰富时收粮入库,在首季作物尚未成熟而春天粮食匮乏时发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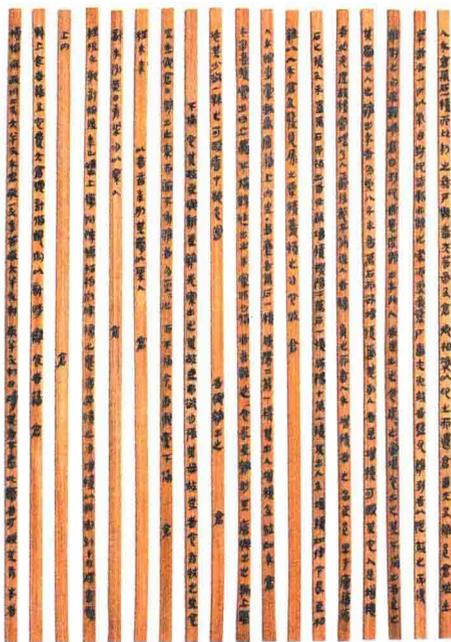


图1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之《仓律》

粮食。由于国家储存可食用物品,粮仓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政治性机构。运行良好的粮仓可以保证即使在遭遇旱涝灾害时人



图2 东汉中仓租券签牌

们也能够生存,并保证军事胜利。与此同时,腐败也是常见且不可避免的。粮仓管理人可能会利用职权或通过偷窃将部分粮食占为己有,以帮助其家人度过饥荒。管理这些粮仓机构的方法是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重点是保持制度平稳运行并对粮仓管理人员进行检查,同时尽量减少其数量。其内涵的观念是完善资源管理,其理想状况是以相对稳定的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做到较高级别的再分配或生产的均衡。在我看来,粮仓管理构成了早期中国政府会计的核心。



图3 汉代税赋总账牍

(二) 货币化和货币单位

有关人口和粮仓管理的账务记录无需货币化。经济的集约化和货币化发展始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对于会计人员而言,将稳定的计量转化为不稳定的货币价值,是一种新的挑战,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它使不同的物品通过价格实现互换,并提供相对稳定的交换媒介。在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中,物品及其价值可以通过价格来计算。早在战国时期就已达达到这种状态,并且,通过西汉时期的繁荣,我们可以断定在当时的日常活动中货币计价相当普遍。与此同时,金属货币及金银依然是商品。作为钱币,金属货币及金银被定义为按规定比例服务于特定功能,但其货币价值在于其内在金属价值。货币化会计成为普遍,但对许多经济活动仍不适用,最明显的是对人口登记和粮仓管理系统。货币化价值显著提升通用性和可计算性,但在会计中价值仍然只是一个价格标签,并且该体系仅限于商品与货币本身的交易。按实际货币进行的会计适用于交易活动以及收入、费用、贷款货币价值的记录。项目化的明细账依然作为账簿记录的基础。

实际货币向标准货币单位的转换——即商品价值以及实物货币转换为单一的、标准化的货币单位——实现了理念上的突破,大大拓展了通用性和可计算性。这一记账单位按实际金属和货币价值定义,但不再需要是一定实物。在中国,这种转变始于宋代,当时采用的钱币标准单位“串”(也称“贯”、“千文”)与串在一起的钱币实际数目是相分离的,在明代,货币的标准单位转化为银“两”,更为成熟。这种货币单位按重量和纯度定义,但不需要按实际存在的“库平两”(国库使用的货币计量单位)物质化。由此看来,晚唐至宋代(9世纪至12世纪)、明代晚期(16世纪至17世纪初)和清朝鼎盛

时期(18世纪)是研究中国复杂的会计技术发展的重要期间。



图4 宋代“交子”拓本

(三) 预付款交易、典当业和动态簿记技术

会计中面临的挑战在于合并不同类型的事项并实现通用性。必须有遵循存货盘点原则记录的分类账,在特定的时刻记录需要记录的项目,并通过账目提供有关往来业务的连续记录。从业务控制和结账的角度,必须将这些结合起来,反映出业务的总体状况。

东亚地区的政府会计由人口和税务登记、存货管理(比如粮食及由政府控制的其他商品)、强化的预算控制等所构成。人口登记是根据出生和死亡名单确定余额,通常需要指明达到劳役和纳税年龄的青壮年的人数。有关土地和税收的登记,则要结合耕

地记录,并考虑土地产出率的排序。对控制而言,有关土地和人口的每年“余额”数就已经足够。政府会计的其他领域具体要求各不相同,所遵循的模式却基本相似。无论是在存货(比如粮仓)管理,还是制造业(比如国家经营的金属生产)管理,乃至军用物资的流转及融资方面,会计中都需要进行存货盘点和调查,定期结算并编制报告。预算控制归结为监督国家公职人员,因此侧重于通过检验结余和支出报告控制费用。东亚国家的政府会计计算人力劳动的资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用一系列资产、存货、收入和支出的静态和相对简单的结余来实现这一目的。在人口登记和粮仓管理中,自然是不会出现负值的。负数往往出现在政府财政中,当支出超出收入之时,并会被指责为严重疏忽所致。“使(国库)虚空”被认为是负责官员的个人失职,倘若被发现,他很可能被降职,并被迫以自己的方式弥补赤字。政府会计中并不存在信用问题。



图5 东汉市井画像砖

公司会计服务于相同的目的,但由于业务的规模和复杂性,它具有另一项功能:对企业的业务运作进行连续的监控,并采用能够区分资本、目前业务收入和开支以及应收款项(如拖欠工程款和贷款)的结算程序。在中国,典当行(在晚唐时期被称为“质库”,后来通常叫做“当铺”)显然是首先达到这一

复杂性的行业。此外,在贸易中“提前卖出和买入”(“赊卖”和“赊买”)在同一时期成为既定的惯例。典当业和系统性信用交易要求对应收账款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要求有信用账存在。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可以将宋代、明末至清代认定为需要更详细分析的关键性变革时期。这一发现产生的问题将在第三节予以讨论。

二、史料、术语和制度

前面第一部分,对本文所讨论问题的总体框架做了勾勒,通过对历史转型过程的简要回顾,明确了中国会计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本部分作为第二部分,是在进一步分析所用各种技术方法的材料、术语和基本特征之前,做一些基本的准备。第一小节讨论各种起源和对历史书写的意义,第二小节介绍关键术语和实践以及它们反映的重要性,第三小节概括历史上已知会计制度的基本结构。

(一) 史料

会计史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源:有关活动的记录 and 实际账目。前者通常是产生于史学传统的文本,尽管文献著述也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后者属于历史的遗留,这些资料并非为了有意的传输,只是因为偶然才留存下来。在中国,反映会计的记载最早是有关治国方略的历史文献。在奴隶社会,书面文字被认为是神奇的技术,保管国家书籍和登记簿是很受推崇的工作。关于这一关键活动的历史记载相对较多。因为簿记发展成为一个熟悉和广泛实践的功利性技术,在封建帝王时代较少提及。唐宋时期的政府较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在史学书面记载中较多地提到会计,在文学著作也偶尔提及私人部门会计。由于后来封建国家主要关注其核心职能,导致文化中较多地避开了在

当时看来平常而无用的技能,相关记载大幅度减少。

实际账目一旦完成了使命,便没有传下去的打算。其存续只是出于偶然,取决于材料的耐久性、环境因素和研究力度。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材料主要是关于战国至汉代,以及隋唐时期。前期主要是木质和竹质材料,即便浸在水中也可以保存下来。这些材料成为陪葬品的事实说明,书面材料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在造纸和印刷时代,竹木质材料完全失去了意义。可追溯至隋唐时期的材料大多是在帝王统治时期的外围干旱地区发现的纸质文献,如敦煌和北部草原地带。木材和竹质的耐久性,是早期会计报告、记录和合同文件得以留存的最主要原因。纸张的可保留年代对于学者寻找原始遗留资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废弃的纸张能够经历许多世纪而留存下来,完全是凭侥幸。尤其在中国中部、东部和南部潮湿的自然条件下,发生这种侥幸的机会几乎为零。此外,出于对留下文字的敬畏而将废弃纸张烧毁(一旦不再需要时)的传统进一步减少了文件留存下来的机会。

在整个历史时期幸存的账簿总量很小。由于上述原因,早期文书显示的情况尤其差。据我所知,宋代(人口超过1亿的南部国家)没有留下任何账簿。由于年代更近,而不是因为态度上的变化,从明末开始有意或偶然流传下来的文献数量有所回升。清代则开始大幅度增加。相当多的文献来自私人收藏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偶然发现。由于晚清开始受到西方影响,因此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一时期的材料。起源时期资料的可用性 or 资料的不足,直接影响到我们有关历史反映或不能反映什么观点。对起源时期的调查显示,帝王统治中期至晚期的历史较少提到会计,并不表示“什么都没有发生。”

（二）术语

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术语,不仅是因为强调儒家“正名”,而是因为新术语的出现和现有术语含义的改变往往给人新奇和变化的感觉,因此是确定历史性转变的有用工具。本小节介绍在会计、账号和账目的基本形式结构中使用的关键术语和数字。它借鉴了郭道扬经过艰苦而深入研究得到的结果,但是我的阐述有所不同。

确定会计活动的关键术语是“会”和“计”,而记账的账目称为“账”和“簿”。“会”和“计”出现在古代和帝王时期之前的文书中,两个字均有计算汇总的意思:“会”的字面意思表明国家公职人员负责管理户籍登记,并计算国有资产,如税收(赋)和劳役、粮仓系统和国家对盐、铁和各种其他物品的生产和分配系统,以及军事融资、物资供应和后勤(军需)。“计”可能更广泛地指在上述国家核心活动中进行计算的活动。之后很久才出现二项式“会计”。在古代至秦代早期,负责户籍登记和政府会计的官员是最高级别的公职人员,然而,秦代晚期认为专业会计的级别较低,通常作为朝廷官员的随从。

早期的文献没有将账目与其他书面文本区分开来。具体的术语“簿”和“帐”在早期的文书中就出现了,反映了重要性的变化。术语“簿”偶尔出现在秦代早期的文书中,但是只有在与“帐”结合在一起时才与户籍管理和账簿相关联。“帐”原指用屏隔开办理赋税事宜的房间或指在这种环境下使用的卷轴书,而“簿”在出现造纸之后指的是线装书。从卷轴书向线装书转变大概是在北宋时期。到了明朝,会计账簿通常用蓝色封皮装订,因此被称为蓝簿。作为词组的“帐簿”在明代晚期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从中字旁“帐”变为贝字旁“账”。但是,这两个字仍然都在使用中,这种变化表示与“帐”

的其他含义(屏、幕等)区别开来。

会计人员使用多套数字。除了普通数字,至少还有两组被普遍使用。“大写”数字是汉字,为了防止篡改和书写错误,大写数字可以追溯到帝王时代以前,但在唐代才有固定的形式并得到广泛使用。此外,一组简化的数字(草码)在计算中出现并且经常在总和和金额的小数中使用。这套数字可追溯到先秦时楚国的书写系统。因为它是用于草稿而不是终稿,从明代晚期开始才有关于其使用的记载。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会计中使用的数字

普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大写	壹	貳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草码	丨	川	川	×	δ	一	二	三	文	十

（三）会计系统

账目的基本格式由垂直书写系统形成。目前的研究认为,将“入”放在上方而“出”置于下方的形式可以追溯到汉代写于木简或竹筒上的文字。从笔者能找到的复制品竹筒上面,一直没找到能证明这种格式的系统应用的可靠证据。“来高去矮”、“上来下去”、“上收下付”这几个术语似乎都在展现这样的画面:人在接收时礼貌地将手朝上的姿势,而给出时是向下的手势。因为这一结构只有在结余时才有相关性,因此问题仍未定论。然而,政府公职人员的开支报告以及经济交易的往来账户出于节约书写材料的考虑,通常是简捷的结构列表。正如上面提到的,并没有账目留存下来可供对这一时期的账簿记录形式进行具体研究。

作为会计中最终也是最复杂的步骤,会计结算反映会计技术的标准化和成熟度。根据郭道扬的研究,政府会计在唐代晚期达到成熟阶段,出现“四柱结算法”,这种方法一直是之后1000年的标准,直到帝制时代的结束。这种方法按类别计算四柱,分别

是：“旧管”——列示开立账户时或会计期间开始时的资产；“新收”——新收到的；“开除”列示扣除的费用；“实在”——表示实际存在的，即结余。这种会计平衡系统的目的显然是进行预算控制。它确保在一个新的会计期间或一位新官员接管时资产或赤字在进行任何新的交易之前被清楚地记入账簿。“入”账和“出”账从相应的往来账户直接照搬。产生的总和必须“实际存在于”钱库或国库。

非政府领域的会计操作方法只是在明代才有了一些具体材料。在较早时期，这一领域的会计与政府会计存在一定差异，但只能做间接推断。例如，在关键术语方面，从秦代早期至唐代晚期，政府会计中都是以“出入”作为标准术语表示收入和支出的款项，而在非政府领域，“收支”表示收入和支出的款项，这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区别。

在明代仍普遍使用的业务记账平衡法（称为“誊清账”或“总清账”），根据所有的收入及支出台账计算出营业额及毛利。要计算“利润总额”（共利），加上在会计年度开始时持有的资本及货币资产（原本），同时扣除税赋、未付款项和借款，得到净资产。对投资者的利润分配（分红）根据一个固定的比例计算得出，并从盈余净额中支付，而“剩余资产”（仍存）成为下一会计年度的现有资产（本）。这种相对简单的会计平衡系统对于股份制公司计算净利润和利润份额是非常有用的。

到明代末期，可能普遍使用一种叫做“三脚帐”的会计平衡系统，但是这种系统的起源无法考究。“三脚”账包括三本账簿，一本用于记录商品，称为“货清帐”，一本记录款项，称为“银清帐”，另一本用于记录交易，即往来账（赊卖账）。普通交易只记录一次（一脚，即记一笔账），而自唐代末期之后盛行的预售（赊卖），按照出账和入账（二脚）交易记账。因此，销售商品可能仅仅在商品账

里记录为收入，而预售除了在商品账里记为收入之外，还要在往来账里计入未收到款项。因为笔者没有亲眼见过“三脚”账，还无法确定在赊卖中最终分期或一次性收到款项时如何记账。这一系统的出现对于经常进行赊账买卖的当铺交易和商人至关重要。通过定期现金支票，盖上清算印记或说明往来账户的差异，“三脚”账实现了对不再要求当场现金付款业务的有效监督。

有人认为在这个时候，账户平衡的结构已经成为固定的形式。账户一般包括“上方”通常称为“收入”（来账或收账），所有收入金额记录于此，而“下方”记录所有的“出账”（去账或付账）。资本投资（本）和（到期）应收的未偿付款项（该项）以及，“应扣除”的款项（除项）计入“上部”，存货计入下部的“现存货物”（存项）。

明末清初，山西银行家和企业家（晋商）发展了“龙门账”。这种会计方法也将账目分为四类，但与之前的会计方法有所不同。前两类为“进”和“缴”，似乎只是用词上的改变。“进”包括所有收入款项，就如“收”，“缴”代表所有支出款项，就如“支”。后两类略有不同：“存”包括资产及存货，“该”包括应收账款以及资本投资。这种会计核算方法与之前的会计技术之间的差异在于其基于“有来必有去，来去必相等”的原则，由于这一原则，它对每项交易进行双重记账，因此具有更好的一致性和更高的安全性。对一项销售交易，在“上部”的记录收到的数额，在“下部”记录款项金额计入的账户。以这种方式创建的往来账在上部和下部产生两个最有连续性的会计分录。这种账目平衡关系被称为“合龙”，因两条卧式柱与龙的形状相似。入账的总和减去出账的总和为毛利，加上资产减去资本投资和未付款项。

四脚账也称为“天地合帐”，有人认为类似形式的会计平衡方法是在清朝鼎盛时期逐步形成的。这种账目平衡方法通过将所

有账目分类计入上部和下部,通过合计金额相等实现控制,是更为完整的复式记账系统。

尚存的龙门账和四脚账在 19 世纪下半叶才有记载,因此,历史上对于这些会计方法的很多方面尚不明确。笔者仍然在努力查找文字出现时期的资料,因此未能研究赊账的处理。

三、宋代典当行会计

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确定,唐代晚期至宋代,乃是一个重要的动态发展时期。由于缺乏原始资料,对这一时期的会计方法,除政府会计之外,我们所知甚少。对其间商业会计技术的发展演进,只能通过分析前后情况间接推断而出。在本节中,我们将通过这几方面来进行推断:(1)研究唐代晚期至宋代的经济环境;(2)观察货币历史及记账单位(而不是真正的货币),并将其与复杂的商业活动结合起来,如典当行及赊销。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将从对宋代晚期典当行会计的回顾性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一) 经济环境

作为帝制时代的中间时期,隋、唐和宋代与帝制早期之间有着三个世纪的隔断,其间人口剧减,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也开始从“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南移。这一时期的帝王自然地将自己置于文化传统的迁移中,但在许多方面有很大不同。在此处所关注的经济生活领域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经济的重新货币化、经济生活之强度和广度的日益增强,以及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带来的文字和书本知识的高速发展。铸造于盛唐时期(公元 713 年和 741 年之间)的开元通宝,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的标准货币。到 8 世纪初,唐帝国的货币化被认为已经超过了汉代(公元前 206 年至

公元 221 年),而两朝的地域相当,人口都约为 5 000 万。当其辉煌之时,唐朝是一个管理极为规范的贵族社会。唐代晚期(760 年始),国家的权力渐趋衰弱,一种新的势能开始出现。随着国家权力和贵族的特权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强劲的势头。由于富足的标准化货币,以及国家基础建设的兴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运河的开挖),使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和专业化生产获得了极大裨益。唐代之后曾经历了短时期的衰退,与之相伴的是受到一定限制和制约的军事对抗,继之而起的是疆域大大缩小的大宋王朝。尽管在北宋时期与金和西夏的争战频繁且规模不断扩大,其后南宋在与蒙古的对抗中疆域不断缩小,但经济发展的态势却一直在持续。终宋一朝,经济的强度空前加大,使农业中也像工业中一样出现了市场化生产及专门化经济。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只统治了中国南部的部分领土,但人口总数估计接近 1 亿。物质财富、社会流动性、长途贸易以及由于印刷书籍推动的学习和写作知识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生活。

宋代国家依然积极地参与经济,一方面间接地行使国家对经济的监管权,另一方面直接从事国有化生产并建立了国家配送系统,如盐和金属生产。可以确定,这一时期的政府会计采用四柱式结算系统。该方法显然也适用于私人部门。敦煌遗书中 10 世纪初沙洲净土寺的算会报告就采用了该系统,表明在唐政权灭亡时这一会计系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除了属于一家机构性组织的这份证据之外,我们并不了解私人部门所采用的会计方法究竟是何种类型。

《续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北宋时期杭州地区一位名叫郑旻的商人逃税事件,这位商人的棉布生意规模很大。宋仁宗嘉佑四年(公元 1059 年),一名官员在被派往检查他的账簿时发现:“其家簿记,积计不税者几万

端”。这句话不经意提到商业会计并包含耐人寻味的信息。首先,这位商人对其生意进行了记账;其次,其账簿如实记录了逃税情况。第二个方面的情况说明郑旻并没有料到政府会检查账目。反过来也表明,商业簿记是用于反映业务活动的,而不是用来与国家机关进行沟通,或为了注册登记或纳税之目的。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显示了11世纪商业活动的复杂性,同时也是最早的明文记载。

(二) 实际货币和记账单位的复杂性

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货币制度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唐朝鼎盛时期(约公元750年),现金和布匹是两种最重要的货币。两者都是标准化的货币形式,代表着接近或等于其本身价值的货币价值。然而,唐朝铸币的成功,即大量铸币的出现造成其他货币的衰落。公元780年时,这种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最重要的曾经可以用现金和布匹缴纳的耕地税,变成只能用钱币支付。从这一点来说,布匹已经失去其货币功能。晚唐时期,白银开始作为货币使用,表明由于经济活动规模日益扩大而需要更高价值的货币。

这一趋势在宋代一直持续。但货币管理却开始变得日益混乱。当国内的铜矿资源几乎用尽,铸币的重量更轻且含铜量更少。南宋失去了最重要的铜矿开采区,最终不得不铸造铁币和使用纸币。钱币的多样性和越来越多地使用非铸造银两使货币体系变得日益复杂。这样看来,在宋代开始,观察银两和铜的交换率以及使用“一吊钱”(千文,也称“贯”或“串”)作为记账单位被确定为与银两标准相当。理论上,一吊钱包含1000枚钱币,实际上却因为钱币的大小和内在价值,以及银与铜的兑换率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实际的市场交易中,钱铺会将一吊吊钱装在一起,签封后用于更大的交易。在

账目中,因为叫法相同,很难区分真实的一吊钱和作为记账单位的一吊钱。然而,直观的理解是,宋代的1千文不再等于1000文钱币,很可能在逐渐成为记账单位。

货币状况的改变和记账单位的采用,一方面额外增加了调整实际货币性资产与账目一致性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有重大收获,即实现了互换。要使货币性资产与账目一致,需要收款人员每日对钱币和银两的价值进行评估。实现互换是很重要的。之前的货币是并行系统,互换性很低。因此,当一项交易发生时,如果采用货币计价并有指定的货币价值时,记账时需要记录资产本身的价值和标准价值。事实上,账簿中仍然有记录货币、货物、土地和人口的明细账。当以铜为基础的货币和非铸造银两所构成的复本位制得以确立时,比较而言,货币价值才真正实现了互换。兑换率代表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值。尽管本地货币可能并不允许进行货币兑换,但会计人员能够采用一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交易可指定一种货币价值,无论是用钱币还是确定纯度和重量的银两。

(三) 典当行

典当行,在唐代末期称为典库,后来通常叫做当铺,显然是最早的系统性的信用交易。典当行通过实物担保预付款项,因此,其利润来自于商品赎回或变卖收入扣除所借款项的手续费和运行成本。勉强维持生计的小当铺在夏季收当污秽的衣物,希望衣物的主人在秋天因身无分文而无法赎回自己的抵押物,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误导性。这样的店铺肯定存在,但在唐宋后期的许多城市中,许多当铺已经发展成为多元化的店铺,有无数分店和大量储存设施。因为涉及典当品(包括一袋袋粮食、名贵珠宝,以及大笔钱财等)的储存,因此,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当铺因此具有了超出其最初业

务的功能,如类似于银行的钱财保管功能,提供担保性贷款,通过各处分店进行财产转移,也就不足为怪。

典当行的另外两个核心竞争力是商品价值的评估和记账。尚存的封建时代后期的簿记引起了前学者们对前者的关注,对后者则尚未发现有集中的调查。典当行会计的最早表现见于元代戏剧中。元杂剧中涉及一个名叫贾仁的官员,拥有非常多的地产,还收购了一家当铺、一家磨坊、一家榨油坊、一家酒厂。贾仁聘请了一位名叫陈德甫的人为其记账。在这出戏剧中,陈德甫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小可今日正在他家坐馆,这馆也不是教学的馆,无过在他解典库里上些账目。”

从在酒厂工作的另外一个人物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陈德甫也负责登记其他店铺的账目。此人这样解释为什么当有人来检查时他已经热好了酒:

“俺这酒店是贾员外的,他家有个门馆先生,叫陈德甫,三五日来算一遭账。”

上述两句话是我们从元代戏曲中了解到的有关会计的情况。尽管对当时的实际记账方法我们仍然一无所知,但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到,即使是相对较小的店铺,按惯例也需要专门的会计。陈德甫在当铺做全职工作,只是隔三差五去其他店铺进行巡察的事实表明,典当行的会计远比酒厂及其他店铺的要求高得多。元代江南以其富足给游人(如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与宋朝相比,该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和人口密度已锐减。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里所反映的元代情况同样适用于之前几个世纪。

(四) 古代的信用交易

业务结构和交易流程的复杂不仅体现在典当行,还存在于其他许多交易领域。“赊卖”和“赊买”为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常用术语。这种交易系统源于区分外出经营的

流动商人和固定的典当行老板(称为贾 gu,后也称牙行)贸易组织。国家控制主要集中在获得许可证和设立服从市场规定的典当行方面。牙行满足商家住宿的需要,为其货物提供仓储设施,并在当地市场上作为中间人介绍批发和零售业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服务延伸到安排旅行和运输,以及金融和信息服务。商家通常向中间人出售他们的货物,而不是直接进入市场,因为后者了解本地情况,有声望也有人脉关系,可进行可靠的转卖业务。这一系统为流动商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同时它将典当行老板置于贸易商和零售商或分销商之间的重要枢纽地位。赊买和赊卖即是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商人可以用赊账方式购货,在售出货物后再一次性或分期付款。这一系统降低了在贸易活动中准备大笔贷款的需要。为买方提供担保的保证人参与进来并在买方不付款的情况下承担责任,导致卖方风险降低。同样,大客商可以提前向生产者购买商品,以保证连续供应并保护其市场份额。

在信用交易中处理应收账款的需求与典当行相类似。由于缺乏有关该行业所用会计方法的实际资料,我们只能推测,这两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采用类似的赊账会计处理办法。

(五) 帝制晚期典当行的会计核算

只有清代留存有典当行的实际账目。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性,将对该系统做简要的描述。这一时期,每个店员会记录自己的“草账”,作为初步记录。对于往来账户,这些被转入“典账”和“钱簿”,典账记录典当的货物,现金账记录现金流。每天结束时以这些台账为基础编制“总簿”。这种平衡系统的目的是计算出“当本”,这个术语有点神秘,其字面意思是“当铺之根本”。“本”之本意,是指为公司资产花费的货币价值,如“资

本”，即公司成立或扩张时投资于货币性资产的资金，“工本”指给雇员支付报酬所需的资金，“产本”指生产性资产。从其他相关的术语推断，“当本”可以理解为“获得典当物需要的资本”或“典当资产”。从技术上讲，这种会计系统每日通过系统的平衡来计算盈亏，从而控制现金流、应收账款和储存的货物。

帝制时代中后期会计发展的间断没有汉代和隋代之间那么明显。然而，蒙古统治时期因为战争和气候变冷仍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元代的人口只是宋朝的一半。明代恢复了受到严重创伤的汉文化统治，并着力于重建和恢复传统文化，以消除蒙古的威胁，改变宋代以来积弱的状况。为此，认为从唐宋到明清连续性未曾遭到破坏的观点是危险的。长途贸易和大型贸易得以幸存下来，然而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我们也没办法确定会计技术的发展究竟是间断的还是稳定的。然而，对历史背景的间接探索已显示出了其进展。我们注意到了私人业务领域的专业化。从货币史及会计记载可确定从宋代开始即采用货币记账单位。贸易史反映，因为交易的复杂性日益增加，信用业务更为普遍，这一点有力地反映了会计史上的主要进展，但是由于没有记载资料，从而无法做更详细的说明。

四、明代晚期行会会计

本文到此已经探讨了会计史的基本模式和一般趋势。本节探讨从明代最后几年至清代鼎盛时期处于经济实力和水平底部的人所熟悉的具体会计技术。

“汪氏会簿”其实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从1639年会社成立至1755年，年度结算账户几乎没有间断，现有关于汪氏和其会社的唯一信息是，它起源于徽州地区。该会社是由4位家族长辈和14位创始会员共同创

立。创始资本总计为七“两”（约260克）银子。该资料因为被大众所熟知，因此很有趣。因为这些账簿的持有人充其量只是小规模商户，更可能是在料理农活和经营小型房产之外沿街兜售的小商人，反映中上层最底部的人所熟知的会计操作方法。下面，首先再现该会社和其背景，并继续对其会计操作方法进行分析。



图6 汪氏会簿172f中第一页中一份相当系统的年度报告，日期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8年）

（一）会社

汪氏家族居住在安徽省南部徽州地区。从明朝鼎盛时期开始，这个农业生产相对低下丘陵地带，由于开始出现一些成功的商人而声名鹊起。徽商活跃在长江中下游的食盐销售网络中并获得丰厚的利润。但是，汪氏会社并没有广泛分布的商业网点，其业务仅仅是从一年一度的祭祀大会中筹得一小笔款项。

该会社的会员仅限于汪氏家族的男性成员。若要成为会员，每家需支付0.5两银子。它涉及两个谱系，我们从姓名中代表家族辈分的字得知：这4位长辈创立者的名字都有一个“应”字，第二代都有一个“玄”字，只有一个名叫华寿的人例外，这个人可能加入了汪氏家族。第三代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和“朝”字，第四代只有一个谱系，代表家族辈分的字“茂”或“懋”（元朝的谱系）。其中一位创始会员很快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华寿。另外，一位名叫“三元”的人在会社成立一年后加入了会社。会社从一开始就计